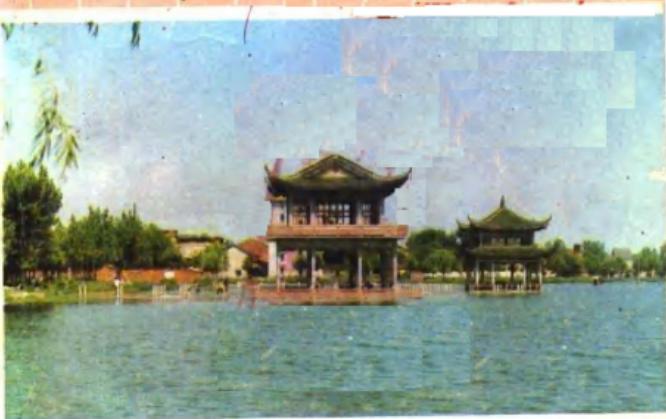


天門文史資料

华侨专辑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門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谨以此书

献给亲爱的天门籍侨胞

献给天门市成立大会

封面题字：郭预衡

封面设计：孙普庆

封面摄影：王西祥



竟陵鸟瞰

天门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门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资料

1986年8月

省委书记关广富(右二)
在县委书记龙望友(右一)
陪同下接见著名三棒鼓演员
陈登洲。

刘士安摄



定居斯里兰卡的爱国
侨领张德焕在回国观光宴会上酬酒。
张德善供稿



原天门籍华侨、法国
电化学博士余良策及其夫人回国观光时与故里人亲切交谈。
彭立乾共稿





侨乡马湾影剧院
刘士安摄



归侨后裔
刘士安摄



传统节目三棒鼓
刘士安摄

目 录

侨乡简介	(1)
天门华侨的四个特点	朱士嘉 (3)
天门籍华侨述略	萧致治 吴守一 彭鲜旗 (4)
欧洲天门华侨史稿	陈里特 (20)
湖北天门华侨移徙欧洲史略	陈树发 (56)
早期在欧洲的天门华侨妇女	黄国胜 (69)
天门华侨万里飘流记	徐艺圃 (78)
天门华侨在东南亚	吴守一 (82)
斯里兰卡爱国侨领张德焕	向 东 (85)
李三春在马来西亚	延 陵 (88)
美洲天门华侨简引	谷 越 (90)
访湖北天门侨乡	廖 铢 (94)
近年天门华侨回乡探亲概述	彭应龙 (95)
天门侨联——华侨之家	李灼胜 (99)
马湾几年大变样	郑瑞林 (103)
在废墟上重建的干驿	杨保廷 (104)
欢迎您到干驿侨乡来	鲜 旗 (109)
教育之花盛开在状元之乡	芦市区 (112)
侨乡天门的民间艺术	刘安国 (119)
附 录	
天门人移徙欧洲小史	《华声报》 (122)
从清档看早期湖北天门旅欧华侨	徐艺圃 (123)
天门华侨史简述	安 琪 (128)

侨 乡 简 介

天门县位于江汉平原中北部，面积为2,603平方公里，人口140万，在湖北省所辖县中居第一位。全县辖四个办事处、十八个镇、七个乡、两个农场。

天门古称竟陵，《东皋杂录》说：“竟陵者，陵之竟也。”意思是山陵到此终止。后因避皇帝的名讳而一再易名。清代雍正年间，以县城西北有天门山而改名为天门县。天门县文物古迹很多，著名的有城西北的罗家北岭新石器时期遗址和殷商时期的土城遗址、县东北五华山上的古风城、伏羲殿遗址和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所建的白龙寺；以及唐代《茶经》作者陆羽、明代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的多处遗迹等。

天门县是五万六千多名华侨和外籍华人的故乡。他们散居在五大洲三十九个国家和地区，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些人成为知名的学者、专家。他们身居异域，不忘自己的故乡。近年来，有不少人回国观光、探亲，关心侨乡的建设，受到热情的欢迎。有些人回乡定居，他们和一万五千多名侨眷都得到当地政府的妥善安置和照顾。天门县人民政府设有侨务办公室，兴建了华侨旅行社和华侨综合服务公司，成立了归国华侨联谊会，专为华侨服务。

天门素以文化之乡著称，教育冠盖全国。解放以来，天门培养出小学毕业生七十多万人，初中毕业生三十多万人，高中毕业生九万多人，共输送大学生一万零四百七十六人。特别是在近几年，天门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曾一度被人们称为“高考状元县”。

天门是全国著名的产棉县之一，年产皮棉连年超过百万担，天门境内多湖泊，为全国商品鱼基地之一，年产鲜鱼二千一百万斤，天门的黄花菜产量在湖北省居首位。

天门原来没有现代工业，现有机械制造、轻工、纺织、化工、建材、食品等工业部门。一九八六年工业总产值是一九四九年的74.38倍。著名的天门塑料盆景畅销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十亿神州第一家”。传统产品“天门绢”和蓝印花布等，深受国内市场和海外侨胞的欢迎。

天门县水陆交通方便，外有车船直达武汉、荆州、沙市等地，内有班车通往各乡和各个农场；商业繁荣、集市贸易活跃，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学技术事业日益发展。今日“天门大开”，积极贯彻执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热情欢迎海外朋友、华侨、港、澳、台同胞来天门观光旅游，探亲访友，洽谈贸易。

原载《湖北一瞥》

天门华侨的四个特点

朱士嘉

湖北华侨成批出国，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其中以天门人居多。他们与广东、福建华侨在出国方式和谋生手段等方面有其独特之点。

(一) 天门解放前十年九涝，颗粒不收，加上政治腐败，敲诈勒索，迫使劳动人民背井离乡，外出谋生。

(二) 天门华侨，往往一家几口经历由走近门到走远门，由流浪国内到流亡出国的漫长历程。

(三) 天门华侨以耍花鼓、卖纸花、挑牙虫为谋生手段，后来从事种植业、运输业、采矿业、镶牙业和饮食业。

(四) 天门华侨人数虽少，但分布面广，几乎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足迹。

以上所说，都是关于天门华侨不同于闽、粤华侨的四个特点。

注：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文题目为《华侨史论丛序》。

天门籍华侨述略

浦致治 吴宇一 彭鲜旗

天门素以湖北侨乡著称。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旅居国外华侨、外籍华人共有2,400户，47,462人；回国华侨565户，1,021人；侨眷1,413户，9,640人。此外旅居港、澳等同胞671户，7,130人；从全国来说，除粤、闽两省外，天门是出国华侨较多的地方。

闽、粤两省地处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各地早有来往，与西方各国接触也很频繁，在剥削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下，走投无路，纷纷侨居国外或者被拐骗出国，是可理解的；湖北位于全国腹心之地，天门又居湖北之中，为何异于内地其它省县，出国华侨居然如此众多？！他们是怎样移居国外的？目前的状态如何？这就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

一、出国原因

今天的天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河渠纵横，交通便利，是人民的安乡乐土。可是，在旧社会，天门却是堤防失修，连年遭灾，千村薜荔，万业萧疏的苦地方。许多人为了谋求生存，不得不辗转迁徙，逃亡异乡。今天侨居世界各地的天门籍华侨和外籍华人，多半就是那时先后移居国外的。考察天门华侨出国原因，主要有下列几个因素：

首先是天灾频仍，人们纷纷出国谋生。

天门位于江汉平原西陲，西北是丘陵高地，东南是滨湖洼地。汉水（襄河）自西北来，由沙洋入境，和其支流牛蹄河、府河（义河）皆并行向东，流过县内腹部地区。自古以来，这三条河常年闹水灾，有如三条巨龙，搅得全县，尤其是天门东乡的人

民不得安宁。据道光《天门县志》卷13记载，“邑为襄河中腹，……河身沙淤，沔阳湖地淤筑成垸，夏秋水涨，来势汹猛，去流壅塞，则腹胀为灾；”“襄河支流自牛蹄口入，至脉旺嘴出，上宽下狭，壅滞为灾。故两岸堤有六年七溃者，有三年四溃者，有二年三溃者，一年两溃者，”每次溃堤无不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康熙元年，“水溢，城上可行舟，居民溺死无数。”乾隆二十五年，“水溢数月，冬大饥，民采树皮为食。”嘉庆十年，钟祥堤溃，汉水直冲县境，县内东西二堤皆溃，“水入城深二丈许，女墙行舟，衙署、民房、城垣、仓库均有倒塌”。

（以上均据《天门县志》卷15祥异志）

光绪二十一年，京山、天门等九州县“江汉并涨，堤垸溃决三百数十处。”（《张文襄公电稿》卷28，第3页）

光绪二十三年，“天门、汉川，被水灾民数十万，不惟无粮可食，无田可耕，抑且无地无屋可栖止。”（《张文襄公电稿》卷28，第3页）

宣统二年，沙洋大堤冲溃，被灾之民数十万，“所有受灾之区一片汪洋，数里不见烟火。灾民有生食野兽之肉者，有握泥果腹致毙者，有掘挖树皮草根以济急者，令人不忍目睹。”（《国风报》第二年第12期，中国纪事，第6—7页）

以上仅致荦荦数端，足以窥见一斑。由于连年水灾，淹没田园，冲毁房屋，种籽口粮，牲畜农具，一洗而空。成千上万的人们，任凭洪水吞没。即或幸存，也是“聚者若浮鸭，散者同游蜂”（《天门县志》卷13），求死无门，求生无路，只得离乡背井，逃亡异乡谋生。

天门籍华侨主要出自天门东南乡，这与水灾明显有密切关系。这一带地势卑下，“四望皆水”，人们为了安居，只得高筑垸堤自保。可是堤垸经不住洪水的反复冲击，一旦溃决，顿成泽

国。人们艰苦创立的家业，立刻瓦解冰消。在旧社会。这里长期流行着一首歌谣：“男子不愿在七十二垸托生、女子不愿在七十二垸嫁人。鱼行鸟窝，鸟无着落。”这首歌，形象地反映了居住在天门东乡七十二垸的人们，由于惧怕水灾对这里所产生的极端憎恶心情。他们正是为了逃避水灾，不得不向外迁徙，寻谋生之路，求衣食之机。

据当地一些老归侨讲，当时出外逃荒，手里多捧着一份“稟贴”。稟贴上面写着：

“家居楚北，籍落天东（天门东乡），素无生理，初未离乎梓里；业勤耕织，岂甘唱夫泣歌！不料阳侯（古代传说中的波涛神）肆虐，洪水成灾，淹没田垸，损毁房屋。牲畜农具，平流逝尽。呜呼！千村哪见烟火起，哀哉！四境不闻鸡犬声。欲生者十无八九，愿死者数以万千。民不得已，扶老携幼，糊口于四方，涉水登山，逃奔于贵境。恳乞贵县机关、修好生之德，赏给口粮，路费，以便前途逃生。卑民如有生之日，永感二天之德也！”

这首稟文，不啻是当时出国原因的生动写照。

天门东乡华侨最集中之地是干一（旧乾镇驿）马湾一带，这里正是水灾最频繁之处。据调查，有华侨、外籍华人、侨眷、港、澳、同胞共2,548户，34,807人。入戶均占全县华侨总数的50%以上。出国最早最多的要数马湾附近的易家潭。那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出过国，现在家家户户有海外关系。易家潭有五个小村，现在人口743人，而由此迁移出国的华侨和外籍华人却有645人，国外比国内的人口还多47%。易家潭本是牛蹄河马湾垸堤多次溃口冲击而成的大水潭，这里地势最低，并且界于牛蹄河、汉水之间。无论那条河堤溃口，这里都要遭殃。漫说汉水水大灾重，仅其支流牛蹄河也像一条铁鞭，足以把这里的人赶得流亡载道。据老归侨谈，易家潭由于深受水灾之苦，附近很早就有“养女莫嫁易家潭，家家户户卖假环”之谣。屡次遭受水灾的易家潭人民，一

贫如洗，无以为生，只得流浪各地，靠卖假环和沿门乞讨过日子。易家潭遭受水灾最多最重，出国的因此最多也最早，充分说明水灾是迫使天门人民纷纷徙迁国外的直接原因。

其次是不甘忍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继逃亡国外。

在近代中国，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是中国人民一切灾难的总根源。从清王朝到蒋家王朝，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逼得天门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四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是天门人民大量迁国外的根本原因。

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无情剥削，压得农民喘不过气。在天门，地主对佃种土地的农民无不征收高额地租，吸尽了农民的血汗。有的地主在改收货币地租时，还要通过折价增加一层中间剥削。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广大农民无时无刻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干一蒋家湖过去是个水洼子，经常闹水灾，加上地主阶级的重利益剥，许多贫雇农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只得纷纷外出谋生。光绪年间，生长在这里的蒋传银只有开垦的几亩湖荒，一间难得遮雨的茅草棚，却有还不清的租稞。光绪二十四年，又逢淹了大水，生活异常困难，催租逼债的却象踏走线车川流不息。那时二十六岁的蒋传银迫不得已，只得携带弱妻幼子，靠丢三棒鼓流浪到了印尼。

反动统治阶级的肆意搜括，榨尽了农民的膏血。民国初年，军阀王占元在湖北统治八年，每年平均搜括一千万元，“共计造出八千万元的资产”，在山东老家买了直达四县的土地（《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0页）。吴佩孚、萧耀南在湖北搜括财富，招兵买马，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反动派在湖北全省抓丁派款，滥发钞票，使得天门和全省一样，无不深受其害。王占

元统治时期，发行地方公债200万，到期本利不还分文，吴佩孚发行金库券340万，加印官票500万纸；（《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91页）汉口的中国、交通及中央三银行共发行钞票8,050万。先后一律停止兑现，全部变成废纸（《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592页）。由于滥发钞票，形成通货膨胀，货币严重贬值。湖北省官钱局发行的官票早年很有信用，清末每张折合银六钱余，1921年王占元去鄂时，犹值银三钱有奇，到1926年，则“有一文不值之概矣！”（《银行周报》，第10卷第20号）他们在直接压榨农民时，任意派捐派款还不以为足，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又实行预征赋税制度。如1924年，军署军事会议议决，强令湖北财政厅通知各县，预征1925，1926两年地丁，并且勒令“限期征解，不得坐误军机”（若愚：《吴佩孚铁蹄下之湖北》、《向导周报》第92期）

反动统治者的肆意搜括，不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大大加剧了天灾的扩大。天灾往往和人祸分不开。在旧社会，天门水灾如此频仍，其重要原因就在反动派不顾人民死活、肆意侵吞堤防修筑费。长期以来，湖北为了防汛，分别从各种税收中用提成，附加、带征等办法筹集堤防修建费，“每年至少一千万元左右。”这笔巨款名义是修复堤防专用，实际上几乎全归中饱。民国时期，除1928年曾经用这笔款修筑过孙家拐堤防外，所有堤防和闸门都未曾大修。而这笔巨款每年却以虚报工事费形式全被侵吞。“上至省主席，下至水利局之杂役，”无不从中得到利分肥。正是因为堤防长年失修，才造成连年溃口，水灾频频不断（《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126—127页）。

反动统治者加强压榨的同时，帝国主义对湖北的掠夺也日益加紧。帝国主义侵略者除大力推行政治控制和文化奴役外，经济掠夺是重要一环。他们在湖北开设工厂，推销商品、掠夺原料，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或者沦为资本主义的附

庸。天门向来广种棉花，“为农者家必兼织”“农隙率妇子昼夜纺织，十室而九。”（道光《天门县志》卷九）他们生产的土布长期畅销陕西、甘肃等省。由于洋沙洋布竞争的结果，土布滞销，无形中夺去了无数农民手工业者的生计。

有压迫就有反抗。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不少人相继逃亡国外，易家潭的老归侨刘大为在天灾国难之际，为了逃避抓丁派款，新婚夫妇跑到汉口，看到外国租界门上都立着“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牌子，就很不满，后来流浪到广州，广州更是洋人的天下，乘车要让洋人，走路要让洋人。于是愤慨之下，随着蜂涌般迁往国外的难民，挤上几乎沉没的难民船，站在水淹膝盖的船舱中飘流到南洋，刘大为老人在回忆中还痛心地说：“我们的祖国，当时就象这只风雨飘摇，几乎沉没的大船一样！”像这样逃往国外的又何止刘大为一个？！

第三是兵荒马乱，希望谋求安定生活环境。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一个多世纪内，外侮内乱，军阀土匪，接踵而来，到处兵荒马乱，弄得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人民渴望安居乐业，为了谋求安定的生活环境，亦只好投奔国外，寻找栖身之所。

据道光《天门县志》记载：天门“为自古用兵之地，绿林不靖，爱动干戈。”清朝末年的混乱局面，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内战，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以及各种土匪流寇，使得天门和全国一样，长期处于兵荒马乱之中。人们愤慨道：“水灾加兵荒，天灾人祸！真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1924年前后，适逢水旱虫灾交替发生、土匪头子张西侯盘踞天门一带，自称侯爷，其老巢就在东乡干一地区。他们在天门到处杀人放火、抢粮抓丁，无恶不作。人们不堪其扰，东奔西窜，躲避兵荒，因此，不少人辗转逃往国外。日本大举侵华、八年艰苦抗战，人民更得不到安宁。这个时期土匪乘机蜂起、七八

个人，三五条枪，就拉起队伍，自立为王，骚扰群众，弄得鸡犬不宁。从1940年至1945年长达六年的时间内，国民党师长王劲哉统率下的一个旅驻扎于干一、田二河一带，旅长古鼎新扩充人马，自立山头，叛变投，敌卖国求荣。这时正是“七年六水”之后又连续几年大旱，古鼎新的强盗队伍盘踞此地，奸掳烧杀，无所不为。人们深恶痛绝地讽唱道：“天见古日月不明，地见古草木不生，人见古胆颤心惊，牲畜见古有死无生，树木见古拔地除根。”干一地区被闹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许多人纷纷跑到国外。甚至有些华侨归国回乡不久，见势不妙，复折身出国。

最后，天门籍华侨能大量出国，还有一些特殊条件。

天门东乡一带长期以来武术盛行，很多人都有一手好武艺，会玩要各种花样武术，以后又从安徽凤阳人手中学会丢三棒鼓、挑牙虫、扎纸花等多种技艺，这些技艺虽然赚不了大钱，但凭着这类技艺可以到处流浪谋生，而且不需要多少本钱，这就为辗转流徙国外提供了便利条件。许多天籍华侨就是因为天灾人祸，被逼得无法安身的时候，拖儿带女，依靠丢三棒鼓、卖纸花、挑牙虫等，先在国内流浪，然后流亡出国。

这些特殊条件，与前面几条主要因素结合，才使天门的贫苦人民得以大量出国。自然灾害、兵荒马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榨，是迫使天门华侨出国的主要原因；玩武艺、丢三棒鼓、挑牙虫、卖纸花则是他们藉以出国的手段。难怪许多老归侨在回忆中感叹地说：“如果不是天灾人祸，我们谁愿意流落异乡？！如果不是依靠一点简便的谋生技艺，我们又怎能漂洋过海，四海为家？！”

除了上述主要原因外，也有其他次要原因。有的是亲帮邻带，乘老华侨返乡机会跟随出国，有的是仰慕先期出国的发了财，梦想到国外捞点钱财；也有个别的因不务正业，赌博抹牌，弄得倾家荡产，不得已逃亡国外；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及

地主士绅，于解放前夕逃亡香港、澳门和台湾，然后转移到其他国家。总的来看，由这些次要原因出国的为数不多。即使如此，亦与当时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反动政府的统治与自然灾害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

二、出国经过

天门人民大约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为了寻找谋生机会，相率向国外移徙。开始是北上逃荒到俄国，以后南下东南亚，最后转徙世界各地。大体说来，经历了北上，南下、“四海为家”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2年前，以北上俄国逃荒为主。追溯天门籍华侨出国历史，以干一易家潭人出国最早而且最多，据目前调查的可靠资料，大约140年前，易大排先以卖假环出近门，后来流浪到俄国，靠卖纸花谋生。从易大排开始，到1922年前，八十年间，出国者共计约1500人。这些可怜的天门儿女，历尽千辛万苦，流亡到异国，人生地疏，语言不通，无法谋生，惟有依靠玩把戏，卖纸花、挑牙虫、丢三棒鼓这些“讨米艺业”糊口，有的还拿着“禀贴”沿门乞讨，从出近门（在国内逃荒）经上海，营口、长春、海参崴等地到达俄国。其间特别是乾镇驿人周树模1908年以奉天左参赞署理黑龙江巡抚，第二年实授黑龙江巡抚，乾镇驿人在连年灾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纷纷前往投奔，因仍找不到活路，随后又成群结队到了俄国。在这前后，前往俄国的人为数不少。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旅居俄国的天门华侨同样深受其害。仅据曾经侨居俄国的归侨回忆，时因饥饿病死或食物中毒致死的就有23人，易双林家五口，由于食物中毒就死了4人。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继十月革命后发生了内战，接着遭到帝国主义的联合封锁和围剿。大战期间，我国